图书情报工作
第 66 卷 第 3 期 2022 年 2 月

数字乡村战略下基层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现状与对策*
——以湖北省 7 县(市)130 村为例

■ 谢娟[1] 李雪[2] 李红[1] 张小雨[3] 秦霞[3]
[1] 湖北省图书馆 武汉 430070 [2] 厦门大学图书馆 厦门 361005
[3] 华中师范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武汉 430079

摘 要:[目的/意义]关注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提高协同治理水平,进而提高乡村层面的基层阅读服务效能。[方法/过程]在湖北省范围内面向乡村居民和阅读服务提供者开展问卷调查,并基于 K. Emerson 和 T. Nabatchi 提出的协同治理整合框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发现乡村层面基层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的现状、存在问题。[结果/结论]分析发现: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还处于比较低的层次。关于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存在相关政策、法律向下传达不足,阅读服务资源尤其是数字资源下沉不足,阅读服务人员文化水平不够,乡村缺乏阅读氛围,乡村居民对阅读服务缺乏信任等问题。关于协同治理的驱动力,各服务主体之间缺乏交流导致不确定性存在,相互依赖缺乏协调性,缺乏激励机制,服务主体跨部门(组织)的领导力不足等问题。关于协同治理动力,存在原则性接触机械且不够系统,基于理解和信任的共同动机作为行为意愿不够强烈,基层联合行动能力不足等问题。基于此,提出依托数字阅读服务平台的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框架及相应的行动对策。

关键词:乡村阅读服务 基层阅读服务 协同治理 数字乡村战略 数字阅读服务
分类号:G252
DOI:10.13266/j.issn.0252-3116.2022.03.004

2021 年 4 月 23 日发布的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报告调查显示,我国城乡居民图书阅读、数字化阅读方式有一定程度的增长,但城乡居民在各类阅读方式接触上仍然存在一定差距[1]。为了弥补这种长期存在的差距,社会各界已经付出了一些努力,开展了一系列乡村层面的基层阅读服务,如农家书屋工程、各种民间图书馆。数字环境下,数字化手段用于阅读资源的建设、组织、提供利用等各个阶段,使得传统资源与服务、数字资源与服务可以更好地向农民传递,如湖北[2]、安徽[3]、江苏[4]等省份推出的数字农家书屋,公共图书馆的线上服务,免费和付费阅读软件的资源提供,短视频平台的阅读资源提供和推广等,呈现多元主体提供服务的态势。

2019 年 5 月 16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阅读服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纲要》中加快乡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繁荣发展乡村网络文化、推进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深化信息惠民服务等数字乡村建设任务均与其密切相关[5]。《纲要》的出台给依托信息技术的基层阅读服务提供了更加利好的发展条件,也为服务协同提供了一定的契机。不同乡村阅读服务主体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服务协同。数字技术环境和相应的政策环境下,为提高乡村阅读服务效能,本研究开展面向乡村阅读服务供需两侧的调查,探究多元主体提供乡村阅读服务的协同水平,了解其存在的问题,明确其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1 文献回顾与理论框架

1.1 文献回顾

多主体提供基层阅读服务已然成为一种趋势,同时也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基层阅读服务相关角色分布在供需两侧。在供给侧,首先,各服务主体存在各自为

* 本文系国家新闻出版署出版融合发展(四川新华)重点实验室课题"数字乡村战略背景下全民阅读协同服务平台构建研究"(项目编号:KT2020018)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谢娟,副研究馆员,硕士;李雪,馆员,博士,通信作者,E-mail:lixue0713@yeah.net;李红,副研究馆员;张小雨,硕士研究生;秦霞,硕士研究生。

收稿日期:2021-07-16 修回日期:2021-09-08 本文起止页码:26-35 本文责任编辑:王传清

政的现象,这造成了资源重复建设、资源浪费。其次,农村居民可获取的阅读内容良莠不齐[6],或无法满足农村居民的需求,或对农村居民信息素养、阅读能力要求过高。再次,基层阅读服务体系化建设不足,不同性质的阅读服务主体缺乏统筹协调,服务的质量和连续性无法保证。在需求侧,农村居民阅读贫困是阅读服务开展的最大难题之一。具体而言,农村居民的阅读贫困体现在对阅读价值形而上的认知[7]、对阅读价值的认知与低效的阅读行动[8]两个方面。

学者们将协同治理视为可能解决此类问题的途径。在过去的几十年来,协同治理逐渐成为解决复杂性公共问题的有效选择[9]。董丽晶、谢志远从协同治理的角度分析新型城市阅读空间,并提出了地方政府、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社会团体、城市居民协同的城市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四中心"协同治理理论模型[10]。李熠煜、马德勤则分析了协同治理视角下贫困山区的阅读推广问题,发现供给侧困境,并提出学校、个人及家庭、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图书馆等服务主体协同为山区贫困者提供阅读推广服务的协同治理模式,提出资源整合与信息共享、公益组织和志愿者发挥主动性实施联合协作、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提供物质基础、拓宽阅读推广途径、发挥贫困人口主动性等协同治理途径[11]。

现有研究提出的阅读服务相关的协同治理机制实际上是对各个主体角色的定义与合作关系的分析。本文认为,协同治理不应仅限于此。因此,本文选择具有预测作用的协同治理整合框架,以此作为工具对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的现状进行有层次的系统分析,以便了解阅读服务协同的概貌,也易于识别出阅读服务协同治理中的关键命题。

1.2 协同治理理论框架

协同治理是由协同学和治理理论融合发展而来。从公共管理的角度来看,协同治理可以定义为一个或多个公共机构连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一起参与的正式的、基于共识的、审慎的集体决策过程,是以实现制定或实施公共政策、管理公共项目和财产的制度安排[12]。通俗来讲,协同治理即多个部门通过多样化的方式,如信息共享、资源与能力互补等方式促进共同行动,实现单一部门无法解决的事务和无法达成的目标[13]。一方面,协同治理是解决公共问题的一种制度安排;另一方面,协同治理强调参与主体的多样性,从正式的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扩展到市场、社会、社区甚至公民[14]。

在协同治理的发展过程中,为增进理解、提升实践,出现了一些协同治理框架。其中,K. Emerson、T. Nabatchi 等提出的协同治理整合框架较为全面地整合了协同治理的环境、驱动力、协同动力、产出效果等多个方面,而不仅限于协同治理的途径、策略。该框架的图形表示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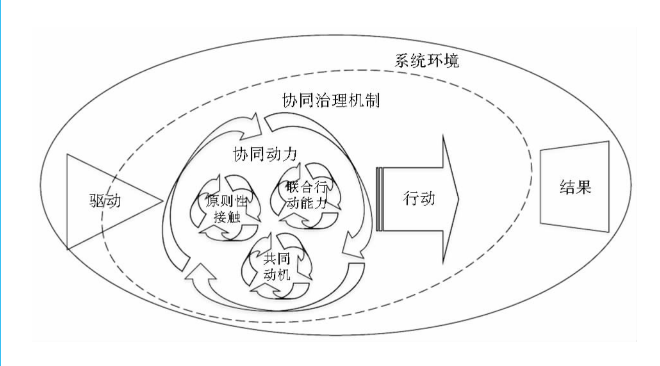


图1 协同治理整合框架[15]

该整合框架是一个嵌套式框架,首先于2012年发表[16],后根据来自学术会议或工作坊的学者及协同治理实践者的意见与反馈形成最终版本。协同机制最外层为系统环境,最内层为协同动力,中间包含协同驱动因素,以及系统环境支持、驱动因素与协同动力作用下的产出机制。通用系统环境包括一切与协同机制有关、能促进协同动力的因素,如政策因素、法律因素、社会经济因素、现有的权力关系、协同主体的冲突历史等。驱动因素主要涉及到领导力、不确定、相互依赖以及激励机制等。协同动力则由原则性接触、共同动机和联合行动能力构成,如发现利益、协商、共同决定,信任、相互理解、内部合法性和承诺,可以共同创造的有效行动。协同治理的结果向度是其产出机制,包括协同行动,可靠效果以及协同的适应性。

2 数据收集

本研究课题组以湖北省为例,于2021年2月1日-3月2日面向乡村居民、阅读服务提供者开展调查研究,调查形式包括实地走访、问卷发放以及访谈等,以问卷调查为主。问卷内容和访谈提纲由课题组成员多次讨论确定,见表1。

问卷调查采用分层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相结合的方法,依据《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中分区、分类推进乡村振兴战略实施[17]的思想,针对"三区"(江汉平原乡村振兴示范区、都市城郊乡村振兴先行区、扶贫片区乡村振兴试验区)和"四类村庄"(集聚发展类村庄、农耕传承类村庄、特色保护类村庄、

表 1 调查问卷结构

调查对象	调查内容	题项
村民	背景信息	所在村庄/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家庭人均月收入
	阅读行为	是否阅读/阅读载体偏好/阅读内容偏好/阅读偏好/很少或不阅读的原因
	阅读服务接触偏好	阅读服务接触类型/阅读服务机构提供资源和设备情况/阅读服务机构提供服务和活动情况/利用阅读服务的困难
	数字阅读设备接触情况	接触设备类型/使用熟练程度/使用设备的目的/数字阅读平台接触/选择数字阅读原因/很少或不使用数字阅读设备的原因
	其他	阅读困难的解决途径/阅读方面需要的帮助/阅读服务开放建议
阅读服务机构	背景信息	性别/年龄/文化水平/所在阅读服务机构
	阅读服务提供	提供资源和设备类型/提供活动与服务类型/阅读活动开展频次
	阅读服务困难	开展阅读服务存在的困难/造成困难的原因
	数字乡村战略	知晓情况/落实情况/对数字乡村战略与乡村阅读服务之间关系的认知
	阅读服务协同	对居民阅读需求的认知/基层政府支持情况/基层政府支持的障碍/数字阅读平台接入情况/与其他阅读服务机构合作情况/合作类型/缺乏合作的原因/是否愿意为共建服务平台付出努力
	其他	开放建议

搬迁撤并类村庄),面向村民,选择黄石市阳新县、黄冈市罗田县、十堰市竹山县、孝感市孝昌县、孝感市孝南区、潜江市、丹江口市辖属村庄发放。发放形式有网站、电子邮件、手机终端、人工发放等多种,总共回收来自 130 个行政村的乡村居民问卷 694 份。面向阅读服务主体的问卷在相同区域发放,发放对象为参与乡村层面基层阅读服务的机构,共回收 158 份。此外,课题组走访了潜江市积玉口镇的凤蛟村、宝湾村,黄冈市罗田县大河岸镇古城寨村,得到许多有意义的细节。调查对象基本情况如表 2 所示:

表 2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对象	项目	选项	数量/位	比例/%
乡村居民	性别	男	364	52.45
		女	330	47.55
	年龄	18 周岁及以下	17	2.45
		19 – 35 周岁	276	39.77
		36 – 45 周岁	184	26.51
		46 – 59 周岁	188	27.09
		60 周岁及以上	29	4.18
	学历	初中及以下	183	26.37
		高中或中专	242	34.87
		本科或大专	260	37.46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9	1.30
阅读服务提供者	性别	男	54	34.18
		女	104	65.82
	年龄	18 – 35 周岁	56	35.44
		36 – 45 周岁	50	31.65
		46 – 55 周岁	47	29.75
		56 周岁及以上	5	3.16
	学历	初中及以下	23	14.56
		高中或中专	42	26.58
		本科或大专	92	58.23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1	0.63

参与调查的阅读服务提供者涉及农家书屋、学校图书室、乡镇文化站、区(县)图书馆等基层阅读服务单位以及文化和旅游局等相关政府单位。其中,来自村一级阅读服务单位有 68 位,来自镇一级单位有 44 位,来自区一级单位有 28 位,来自县一级单位有 18 位。

依据协同治理整合框架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识别供需双侧视角下的乡村层面的基层阅读服务协同治理所在的系统环境、驱动因素、协同动力等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问题,作为协同治理对策提出的基础。

3 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现状分析

3.1 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的系统环境分析

协同治理的系统环境即发生场域,包括基层阅读服务相关的政策或法律、现有的阅读资源、文化环境、各阅读服务主体或居民与服务主体之间的信任水平与冲突历史等。

3.1.1 政策法律方面

近些年,乡村层面的基层阅读服务协同受到支持和鼓励。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及多省市的全民阅读都倡导社会力量参与阅读推广,催生了层出不穷的跨界阅读服务实践。《纲要》的出台也营造了良好的技术生态。可以说,乡村阅读服务的开展与协同治理有良好的政策条件。调查显示,熟悉数字乡村战略的阅读服务主体中,对乡村阅读服务与数字乡村战略的互动关系认可程度十分高,分别有 77.59%、72.41%、70.69%、68.97%、72.41% 认可信息基础设施能促进全民阅读、全民阅读对乡村网络文

化繁荣有积极作用、全民阅读服务是乡村治理的具体表现、全民阅读服务是信息惠民服务的一种、全民阅读服务能间接促进乡村农业发展和经济繁荣。而参与调查的阅读服务主体仅 36.71% 专门学习过相关文件。可见,乡村基层阅读服务协同有较好的政策环境,但是向下解释和传达不及时,需要加强。

3.1.2 资源方面

需方视角下,在 694 名参与调查的村民中,84 名未有阅读经历。其余 610 名中,手机、电脑、电子阅读器等数字阅读接触率(82.46%)高于纸质读物接触率(48.85%),主要原因依次是方便(79.15%)、支持多种媒体(61.15%)、资源丰富(45.9%)、更新及时且传播快(45.57%)等,有村民表示:"线上看书的人多了,村阅读室人越来越少了"。如图 2 所示,偏好的读物内容类型以时事新闻、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儿童教育类居多,资源和服务获取途径方面,主要接触纸质读物推介、辅导居多,其次是微信公众号或网站等线上宣传与指导、数字设备与读物的宣传和推广等阅读服务,线下进行数字资源使用指导较少(见图 3)。数字读物主要通过各种社交平台、新闻网站获取数字阅读内容,公共文化服务性质的数字阅读平台和商业性质专门阅读平台也有接触(见图 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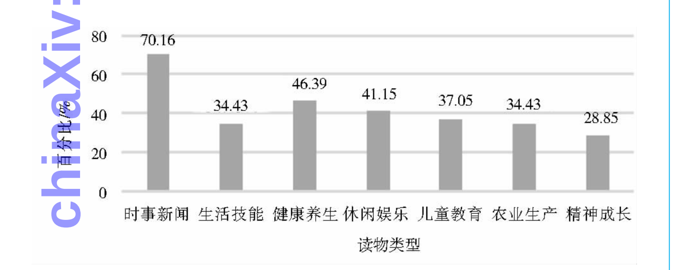


图 2 村民阅读类型偏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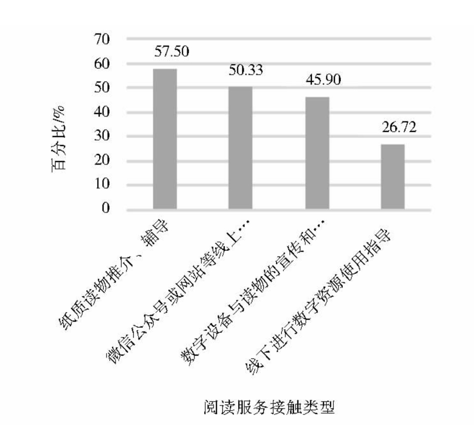


图 3 村民阅读服务接触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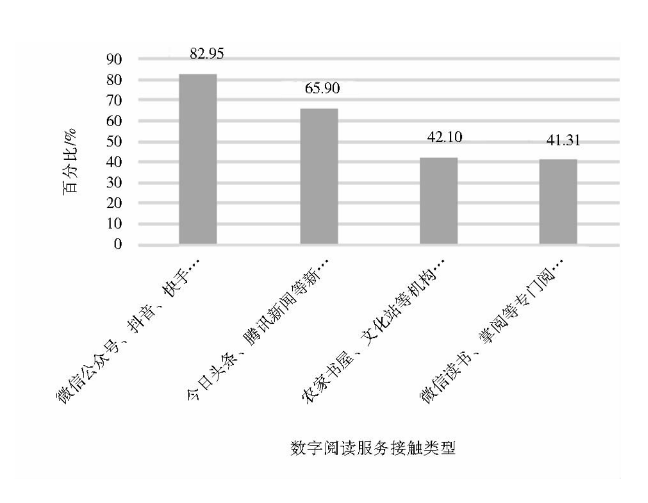


图 4 村民数字阅读服务接触情况

供方视角下,全部阅读服务机构和村一级阅读服务机构提供各类型资源和服务的比例如图 5 – 图 6 所示。在政策、技术支持下,尽管乡村阅读服务受到许多关注,但资源下沉仍离乡村居民需要相去甚远。并且,这种差距在深度的数字阅读推广、数字阅读指导、阅读推广活动等服务上尤其明显。另外,社交平台的作用不可忽视。

3.1.3 文化环境方面

针对需方,阅读服务接触是乡村居民基于自身素质条件和偏好进行的选择性接受[18]。乡村居民自身素质中与阅读服务最相关的是文化水平。参与调查的村民文化水平为初中及以下和受过高等教育分别为 26.37% 和 38.76%。针对供方,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对乡村阅读服务的支持是宏观上的文化环境。乡村阅读氛围、阅读服务提供者的文化水平则是微观上的文化环境。参与调查的阅读服务提供者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占 58.86%。在村一级阅读服务机构中为 29.4%。乡村居民文化水平同参与调查的阅读服务提供者文化水平之间有一定的差距,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作阅读服务的可能性空间。目前,阅读服务提供者的文化程度难以支撑优质、深入阅读服务的开展。

3.1.4 信任与冲突

信任与冲突历史是协同治理中的关键要素,同时也是协同治理应解决的问题。两者之间有一定联系,当信任缺乏时,极易产生冲突。基层阅读服务问题虽复杂棘手,但相较房价、污染等公共问题更为温和,较少引起冲突。在本次调查中,有村民不了解阅读服务的公共文化服务属性,认为自己并没有权利使用阅读服务。笔者在其他基层阅读服务调研中也有类似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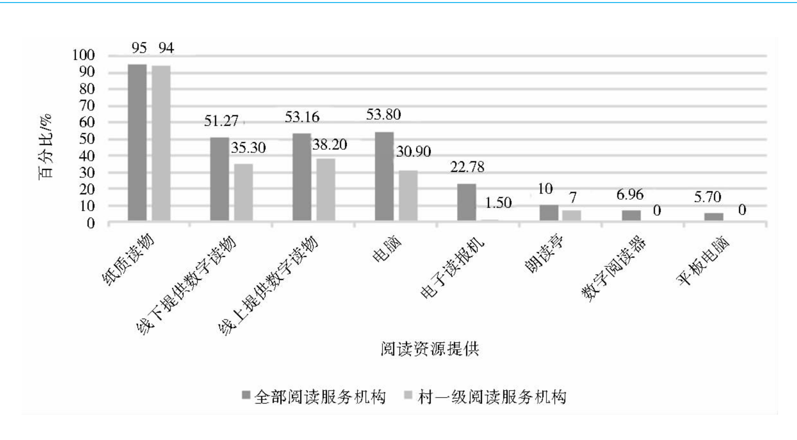


图5 阅读服务机构提供阅读资源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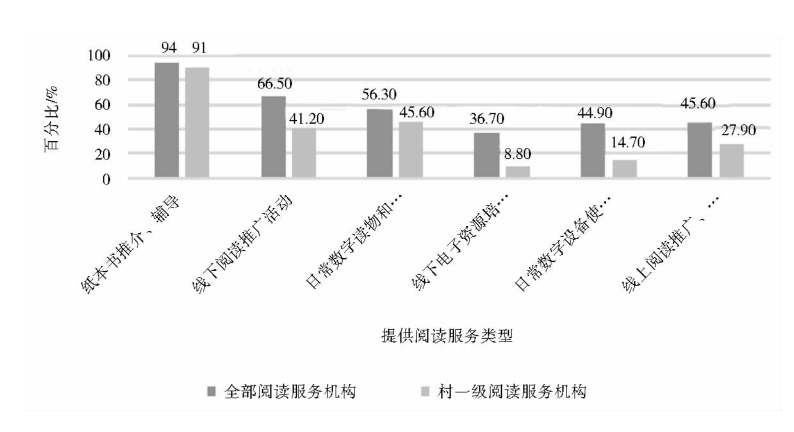


图6 阅读服务机构提供阅读服务情况

发生,居民表示不愿意为基层阅读服务建言献策,因为“说了也没有用”。也有村民因自身养殖需求到农家书屋借书,但发现内容陈旧,便放弃使用。作为乡村阅读服务需求方,对基层阅读服务的不信任是阅读服务协同不易跨越的隐形门槛。

3.2 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的驱动因素分析

在复杂的系统环境中,驱动因素表明各实际参与方为何超越自身利益去促进初始条件发生[15]。当驱动因素存在,乡村基层阅读服务的协同治理可能发生且需要被触发,包括不确定性、相互依赖、激励机制以及领导力等。对驱动因素关注包括其在场情况,以及参与者对其在场情况的认识。

3.2.1 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是协同治理的背景性因素。在乡村阅读服务中,不确定性是指未来的境况、资源、决策等模糊不清、不稳定时,各参与方掌握阅读服务信息有限的情况。例如,参与调查的阅读服务机构认为村民没有阅读需求和习惯是阅读服务开展困难的最主要原因(占69.1%),但又认为村民对纸质读物(77.9%)、数字阅读设备(48.5%)、线下阅读活动(38.2%)、数字读物(48.5%)、线上阅读活动(23.5%)都有一定的需求,两者之间存在矛盾,反映对阅读服务相关信息的有限认知。而相应地,许多村民不知道阅读服务机构的存在。在乡村阅读服务中,不确定性主要体现在供方无法完全知晓需方的需求与选择,需方无法从各供方处获得便捷、高效、针对的服务,供方各主体无法利用现有的资源、技术构建清晰的服务版图。在针对乡村阅读服务供需双方的调查中,不确定性十分明显。

3.2.2 相互依赖

相互依赖是协同各主体选择协同治理而非冲突或竞争的原因。在现实的乡村基层阅读服务环境中,依靠单个主体无法实现阅读服务的目标,不同主体之间有不同程度的依赖关系,这种依赖关系在村一级阅读服务机构也有所体现,是协同治理的基础。如基层政府为其提供场地空间(整体70.89%,村一级61.8%),意味着基层政府通过提供空间的方式参与基层阅读服务,阅读服务机构则依赖基层政府提供的空间。另外,阅读服务机构较多地接入公共图书馆数字阅读平台和数字农家书屋、文化共享工程等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平台(整体62.03%、68.35%,村一级42.6%、61.8%)、较少接入商业的数字阅读平台(整体12.66%、村一级

4.4%)。这意味着基层阅读服务机构依靠这些角色提供服务,而文化共享工程项目、商业阅读服务平台依赖广泛分布在农村的阅读服务机构施加影响。此类阅读服务工程自身有其制度,但彼此互动不多,这种依赖关系尚缺乏协调性。例如,居民最常使用的社交类、新闻类、专门阅读类的数字平台较少被纳入阅读服务机构的考虑范围。

3.2.3 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对协同治理的触发十分重要,协同主体需要诱因参与阅读服务。在参与调查的阅读服务机构中,33.54%认为缺乏激励机制是乡村阅读服务开展困难的原因之一(村一级为25%)。关于协同,参与调查的阅读服务主体认为阅读服务各方合作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有: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54.05%)、缺乏长效合作机制(45.95%)、合作意愿较弱(24.32%)。在村一级,相应的比例分别为55.5%、27.7%、22.2%。尽管如此,参与调查的阅读服务机构中,72.15%支持整合全民阅读各方机构资源和服务且愿意为此付出努力(村一级为67.6%)。可见,阅读服务各主体参与乡村阅读服务意愿较强,但由于多方面激励机制的缺乏,尚无法达到高水平的协同治理。并且激励机制这一驱动因素的缺乏已经为阅读服务参与者所知。

3.2.4 领导力

领导力是协同治理的重要驱动因素。当个人或组织的出席能够促进协同发生,即是领导力的体现。在乡村阅读服务下,当有此领导力的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出现,即有可能促进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的发生。此类角色通常具有密集的专业和社交网络,为关键角色所知道,看起来足够可信、值得信赖。例如,朱永新作为全民阅读形象代言人为各类型阅读组织所知,是典型的有领导力的例子,也从事实上推动了阅读服务的提升。但在乡村层面,目前来看,各阅读服务主体分头治理,尚未出现有足够跨部门、跨组织领导力的个人或组织。调查显示,较少或不同其他主体合作的阅读服务提供者中,40.54%认为没有机构牵头是造成合作困难的主要原因。在村一级,这一比例为33.3%。

3.3 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动力分析

分析协同治理的动力问题,即通过分析乡村阅读服务参与方为何、如何参与阅读服务,尚有哪些问题亟待解决,反映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的初始条件——是否有能力触发协同治理,是否可以有效进行协同治理[15]。

3.3.1 原则性接触

原则性接触意味着协同治理各方出于解决问题、化解矛盾、创造价值等原因进行有目的接触。在协同治理中,原则性接触包括发现、定义、协商和决定的过程[15],包括乡村阅读服务主体阐明自身拥有的资源、关切的价值、利益的诉求,达成对共同目标和彼此预期的共同理解,并提出、讨论、修改和确定相应的解决方案。这种原则性接触围绕乡村阅读服务,既发生在相关政策、制度的建立上,也发生在某一具体阅读服务的开展上。实地调查中发现,乡村阅读服务多为自上而下的制度安排,缺乏有目的原则性接触,既体现在服务提供者之间,也体现在供需双方之间。这与乡村阅读服务的公共文化属性相关,缺乏明确和紧密的利益连结,难以促成原则性接触。竹山县宝丰镇曹家湾村村民表示,现有的阅读服务"积极性与沟通能动性欠佳"。

3.3.2 共同动机

共同动机包含信任、相互理解、内部合法性和承诺。在乡村阅读服务中,阅读服务主体的共同动机包括各服务主体的之间相互的信任,对彼此参与阅读服务的利益诉求以及彼此之间差异的理解,形成动机的一致性,即人际确认和内部合法性[19]。基于此,各阅读服务主体达成承诺,表明他们愿意跨越角色,付出协同行动。调查结果显示,阅读服务供需双方均有建立理解的意向。例如,竹山县柳林乡农家书屋负责人表示,需要"调研村民阅读需求,提供相关专业书籍报刊资料",需要"发展民间阅读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推广阅读"。不同阅读服务主体的共同动机是促进乡村居民阅读。对于这一主要动机,阅读服务主体都较为明确,这与政策传达和先前经验有关。不过,各阅读服务主体的理解意向和共同动机缺乏发起领导力和激励机制的驱动,多停留在意愿层面,未促成承诺达成。

3.3.3 联合行动能力

联合行动能力是动力机制的功能维度。依据框架,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联合行动能力主要包含程序和制度安排、领导能力、知识与资源4种。在程序和制度安排方面,公共图书馆、新闻出版等各个系统内部将服务延伸到乡村层面,如罗田县图书馆每年至少下乡50次为农民送书,这来源于政策支持,但与其他利益相关者深度合作的机制却比较缺乏,如南漳县图书馆工作人员认为,需要"整合管理层次,目前农家书屋为各地宣传部(新闻出版局)管理,乡镇文化中心为文化和旅游局管理,希望有效整合体制"。这也体现出协

同领导能力的缺失。知识能力在乡村阅读服务情境下体现为阅读服务人员的专业能力。多位村一级阅读服务者都表示,需要加强人员培训,表明人员有效行动能力的缺乏。部分村庄有退休教师作馆员(如潜江市积玉口镇宝湾村),但属于偶然选择,而非依托有力政策的普遍现象。在资源方面,调查显示,不同主体已经开展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呈现出联合行动能力。例如,依托各级公共文化服务单位项目接入各类型的数字阅读平台,当地政府提供场地、人员、管理和监督、设备支持、人员培训、数字阅读平台、资金支持等,出版商、书店、公益阅读组织等提供书报、杂志捐赠(73.55%)、合作开展阅读活动、数字资源共享、数字平台接入、合作建立服务点(见图 7 – 图 8)。这说明,在场地、纸本读物等基本阅读设施方面,通过各方努力,已经有较好基础。但更为方便的数字阅读服务或更为专业的人才资源方面尚缺乏,在村一级阅读服务机构中更为严重。总之,联合行动能力仍需要提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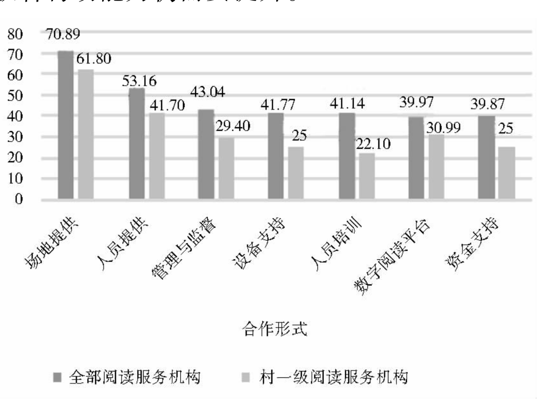


图 7 基层政府参与乡村阅读服务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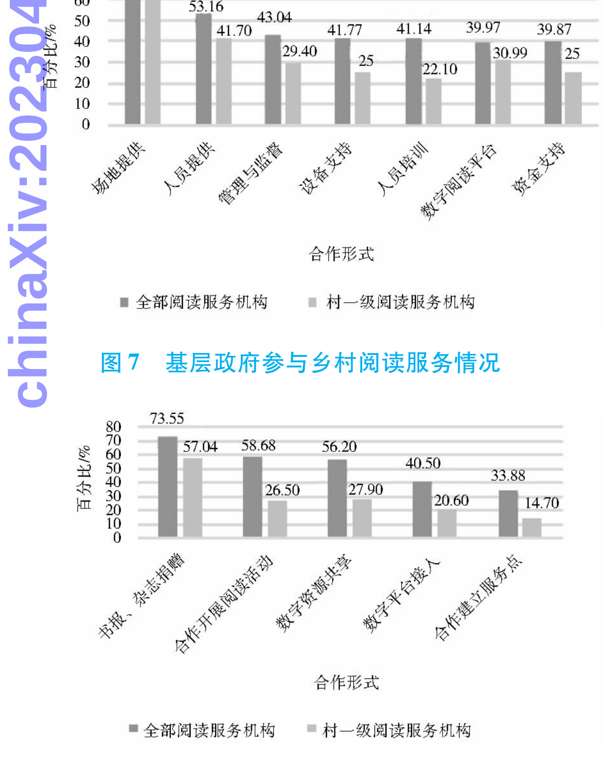


图 8 出版商、书店、公益组织等参与乡村阅读服务情况

4 数字乡村战略下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对策

作为复杂的公共事务,乡村阅读服务需要多方协同。基于上述分析,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有其驱动力与动力,但协同水平不高。关于协同治理系统环境,存在相关政策、法律向下传达不足,阅读服务资源尤其是数字资源下沉不足,阅读服务人员文化水平不够,乡村阅读氛围不足,乡村居民对阅读服务缺乏信任等问题。关于协同治理的驱动力,存在各服务主体之间缺乏交流导致不确定性存在,相互依赖但缺乏协调性,缺乏激励机制,缺乏跨部门(组织)的领导力等问题。关于协同治理动力,存在原则性接触机械且不够系统,基于理解和信任的共同动机作为行为意愿不够强烈,基层联合行动能力待改进等问题。

数字乡村战略环境下,信息设施覆盖,乡村网络文化繁荣,信息惠民服务开展等为上述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契机[20]。具体而言,可依托数字乡村战略环境,构建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框架(见图 9)。数字乡村战略下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框架的核心为数字阅读服务平台。在协同治理系统环境、驱动因素和协同治理动力的交互作用下,该平台依托乡村信息设施、实体和数字的阅读资源,线上和线下阅读服务等建设。基于数字阅读服务平台协同行动和效果表现在 3 个层面:从微观上来看,协同行动是具体情境中的策略;从中观上来看,协同行动是合作有关的机制,如激励机制,领导力催化等;从宏观上来看,协同行动则是整体视角下协同主体、协同要素互动的结构化、制度化[21]。各个层面的协同行动交互作用,也可促进协同治理系统环境、驱动力、动力中各个要素的改进。依据文中分析,提出数字乡村战略下的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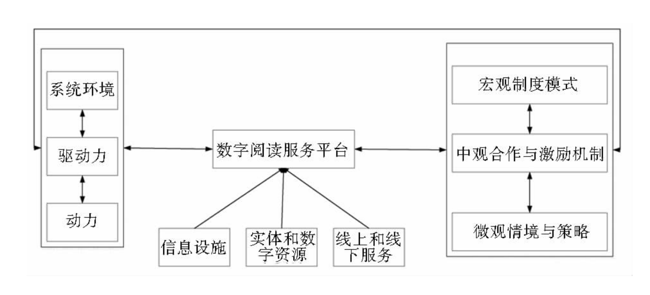


图 9 数字乡村战略下的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框架

4.1 利用与营造并行的协同治理环境提升

4.1.1 多方多级协同确保政策传达与资源下沉

在政策传达方面,借助集成多种设备和媒介形式的数字阅读服务平台,开展面向供需双方的全民阅读、数字乡村战略政策传达与解读。在资源方面,横向上,

阅读资源来源甚多，如将数字农家书屋、公共图书馆线上阅读平台、网络免费资源集成到同一平台，提供利用，统一检索，避免重复建设。纵向上，促进阅读服务各个主体在各自体系的多级协同，以达到资源下沉的目的。数字设施入村使得数字形式的阅读资源和阅读服务下沉更加便捷。

4.1.2 文化环境营造

一方面，村民表示："书香氛围不够""加大投入力度，大力宣传阅读很重要"。可通过线上、线下多种途径宣传阅读。低成本、可复制的数字化方式是很好的选择。另一方面，需要引入专业人才以保障专业服务，深入阅读服务的开展需要文化水平相当的专业、专门阅读服务人员。潜江市浩口镇同心村村民表示"应有专门文化管理员，提高他们工资，让他们常年开放书屋，不分农闲农忙，夏天和冬天，我们随时可以阅读"。孝感市孝南区毛陈镇文化站工作人员则表示："乡镇图书馆(应)定人定编制，缓解人手不足问题！定期开展业务培训，保证工作蓬勃开展。整合社会资源，实现效能最大化"。当人才培养体系尚未完善，依托数字平台的人才整合与远程服务可以暂时缓解人才不足的问题。

4.1.3 多途径建立阅读服务的公共信任

公共阅读服务是公民社会的产物，与公民利用公共服务的意识以及对公共服务的信任相关。在我国，尤其是乡村，居民对公共文化服务利用不足，缺乏信任。可依托数字平台开展公共阅读服务宣传，唤醒公民意识。借助数字阅读平台，接入居民常使用的新闻平台、短视频平台，并将服务内容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22]，拉近距离，建立信任。此外，重视宗族关系是我国乡村的重要特征之一，吸纳乡贤参与乡村阅读服务，也有助于建立信任。

4.2 认知和行动双渠道增强协同治理驱动力

4.2.1 促进交流以减少不确定性

各阅读服务主体之间的不确定性是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的机会，各服务主体应持协同而非竞争的立场。依托数字阅读服务平台，各参与方便于了解自身的优劣势，意识到外部环境不确定下进行合作的必要性；依托平台，各参与方在各自的角色中通过专家咨询、阅读行为轨迹采集等途径理解用户[23]、理解其他服务主体，以减少内部不确定性。例如，潜江市凤蛟和宝湾两村村民兼有水产养殖、休闲娱乐、数字政务的复合需求，需要被服务主体了解并通过协作满足。当数字平台便于各个群体观点的交换，内外部不确定性则更容易被感知和减少。

4.2.2 强化与协调依赖关系

首先需将各种依赖关系进行整合，通过数字阅读服务平台清晰呈现。具体而言，以乡村阅读服务中的空间、资源、服务等各要素为中心，识别出其中的依赖关系，并进行有针对性的协调和强化。例如，调查显示乡村阅读服务与乡村居民接触较多的社交媒体、新闻、商业阅读平台未建立强依赖关系，需要强化。

4.2.3 设立激励机制

基于乡村阅读服务参与方对激励机制缺乏认识，对于阅读服务提供者，可将与其他主体的合作纳入考核体系中，作为直接激励。另外，当服务提供者从村民或合作者处得到正向反馈本身也能作为激励机制的一部分[24]。因此，平台应重视服务反馈、合作反馈的收集与发布。对于乡村居民，为村民建立阅读账户，关联社交平台账户、图书馆账户等，用于服务的提供和反馈的回收，将阅读服务与其新闻需求、娱乐需求相联系，促进对各项服务的协同接触，进而激励各主体提供非割裂的服务。

4.2.4 推动多层次多中心治理机制

在现有基础上，成立专门协调的工作小组，对不同服务情境、不同层面的乡村阅读服务进行分析，在不同情境下，通过权力赋予、服务类型和内容限定等方式[15]，识别不同的领导角色，推进多中心治理。如在乡村或县域选择有影响力的文化工作者做阅读代言人，负责乡村阅读服务协同的发起。

4.3 强化协同治理动力以提升治理有效性

4.3.1 增进各主体之间的原则性接触

基于数字阅读服务平台，一定程度的信息公开可以促进原则性接触的进行和持续，尤其可以促进居民参与接触，增进对阅读服务提供者的了解，将可用资源与自身需求相结合。基于原则性接触，各服务主体可确立自身在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版图中的位置。

4.3.2 促进基于信任与理解的共同动机的认知

在现有的乡村阅读服务主体中，各主体之间缺乏信任、缺乏理解、缺乏合作意识是协同治理的障碍。基于数字阅读服务平台，进行利益相关者分析，引导各阅读服务主体突破现有的界限，对协同服务做出承诺，并将内在承诺落实为书面契约，内在动机与外在约束共同保障协同行动。厦门市沙美公益图书馆(城中村)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负责人表示"一旦你进入社区，他们知道做这个事情对社区好，社区的人都很帮忙""其实你做起来以后就知道了，人们知道我们在为他们做

事情,他们就会非常热情”[28]。

4.3.3 提高联合行动能力

针对数字资源与服务提供不足、人才支持与培训不足等联合行动能力上的不足,数字阅读服务平台可将分布式的资源进行整合,在线开展跨部门的专业人才与志愿者培训,在线开展一站式、跨区域的阅读咨询等,提高联合行动能力。

4.4 动态适应下的协同治理可持续发展

乡村数字阅读服务协同治理预期结果体现在不同层面上:微观上,有效开展乡村阅读服务;中观上,建立协同服务机制;宏观上,建立协同制度。同时,在各个要素不断交互作用下,协同治理框架是动态的,需要不断适应。协同治理机制内,各个层面的协同行动不仅能带来协同治理水平的提高,还能通过政策环境的充分知晓与利用、文化环境的改善、信任水平的提高带来系统环境的改善;促进交流带来不确定性的减少、依赖关系的强化激励机制的建立和多中心领导力的催生,即驱动力的增强;原则性接触增加、共同动机明确、联合行动能力提高带来协同治理动力的增强。另外,在协同治理进行过程中,外在的政策环境、技术环境等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因此,需要进行动态的外在适应。数字阅读服务平台有助于这种动态适应能力的培养与发挥。

5 结语

乡村层面的基层阅读服务近些年受到学界、业界的关注,呈现多元主体提供服务的态势,但也存在协同问题。数字乡村战略为此问题的缓解提供了契机。本文借鉴公共管理领域的协同治理整合框架,分析乡村层面的基层阅读服务协同治理这一具体问题,弥补了现有研究缺乏理论基础的不足。基于此框架,在湖北省开展针对乡村居民和乡村阅读服务机构的调查,并进行供需双侧比较及不同层次基层阅读服务机构比较,了解各主体协同治理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分析发现,我国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已有一定的基础。由于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尚处在较低水平,因此提出数字乡村战略下乡村阅读服务协同治理的框架和对策。本文对乡村阅读服务的探讨属于全局性讨论,细节难免不足,其驱动机制、动力机制、激励机制、适应机制等,以及不同机制中的要素组合等,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

参考文献:

[1]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 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成果发布[EB/OL]. [2021-06-18]. http://www.nppa.gov.cn/nppa/contents/280/75981.shtml.
[2] 韩晓玲. 湖北数字农家书屋探索“百姓点单”服务模式[EB/OL]. [2021-06-06]. http://news.cnhubei.com/content/2020-05/20/content_13060109.html.
[3] 安徽省新闻出版广电局. 安徽省数字农家书屋数字阅读引领未来[EB/OL]. [2021-06-06]. http://www.ahsnjsw.com/.
[4] 江苏省新闻出版局. 江苏省数字农家书屋[EB/OL]. [2021-06-06]. http://jsnjsw.cnki.net/Main_jiangsu.
[5]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EB/OL]. [2021-06-18]. http://www.gov.cn/zhengce/2019-05/16/content_5392269.htm.
[6] 陈含章. 我国数字农家书屋建设现状及模式探析[J]. 出版发行研究, 2017(9): 24-28.
[7] 陈庚, 胡雅纯. 农村居民公共阅读低度参与归因分析——来自湖北省 77 个行政村的调查[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46(5): 36-53.
[8] 王虹, 邓福庆, 杨红岩. 农村阅读的需求贫困与“不发展”原则探析[J]. 图书与情报, 2015(6): 126-133.
[9] 田玉麒. 破与立:协同治理机制的整合与重构——评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mes[J]. 公共管理评论, 2019(2): 131-143.
[10] 董丽晶, 谢志远. 协同治理视角下城市新型公共阅读空间建设研究[J]. 出版发行研究, 2020(1): 74-77.
[11] 李熠煜, 马德勤. 协同治理视角下贫困山区阅读推广的现状、困境及突破[J]. 图书馆研究, 2020(6): 81-88.
[12] CHRIS ANSELL A C.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in theory and practi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07,4: 543-571.
[13] BRYSON J M, CROSBY B C, STONE M M.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of cross-sector collaborations: propositions from the literature[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6,66(S): 44-55.
[14] 胡那苏图. 产业地域典型社区协同治理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 2020.
[15] EMERSON K, NABATCHI T.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regimes[M].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2015.
[16] EMERSON K, NABATCHI T, BALOGH S. An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J].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12(1): 1-29.
[17] 湖北省委省政府. 湖北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 年)[EB/OL]. [2021-04-25]. http://www.hubei.gov.cn/zwgk/hbyw/hbywqb/201905/t20190517_1394193.shtml.
[18] 傅才武, 王文德. 农村文化惠民工程的“弱参与”及其改革策略——来自全国 21 省 282 个行政村的调查[J]. 中国图书馆学报, 2020,46(5): 54-73.
[19] PROVAN K G, MILWARD H B. A preliminary theory of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 effectivenes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our community mental health systems[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

ly, 1995,40(1): 1-33.

[20] 胡维青，张艳花，刘莹，等. 美国农村图书馆与数字共融:问题与挑战[J]. 图书馆学研究，2019(9): 89-93.

[21] 杨华锋. 协同治理——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历史进路[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7: 209.

[22] 曹凌，杨玉麟，林强. 人的发展:文化共享工程效果反思[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14,40(2): 27-32.

[23] 魏辅轶. 中国图书馆学理论跨世纪的三次"重逢"与"莫比乌斯陷阱"[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21,47(1): 34-46.

[24] 李枭. 多元主体参与下的我国城市社区协同治理研究[M]. 北京: 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 108-113.

[25] 沙美图书馆:打造厦大边上的公益图书馆[EB/OL]. [2021-09-06]. https://baijiahao.baidu.com/s? id=1681836068586927901.

作者贡献说明:

谢娟:提出研究思路,组织问卷调查,撰写部分初稿;
李雪:确定论文思路,撰写与修改论文;
李红:实施问卷调查;
张小雨:实施实地调查;
秦霞:实施实地调查。

Present Situation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Reading Services Under the Digital Villages Strategy: A Survey from 130 Villages in 7 Counties (Cities) in Hubei Province

Xie Juan[1]　Li Xue[2]　Li Hong[1]　Zhang Xiaoyu[3]　Qin Xia[3]
[1] Hubei Province Library, Wuhan 430070
[2] Xiamen University Library, Xiamen 361005
[3]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Focusing on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reading services can improve the level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rural-level grassroots reading services. [Method/proces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for rural residents and reading service providers was carried out in Hubei Province. And based on the integrative framework for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proposed by Emerson and Nabatchi, the survey results were analyzed, and the status quo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Grassroots reading services at the rural level were found. [Result/conclusion] The results show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of rural reading services is still at a low level. Regarding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system environmen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downward communication of relevant policies and laws, insufficient reading service resources, especially digital resources, insufficient education of reading service personnel, insufficient rural reading atmosphere, and insufficient trust of rural residents in reading services. Regarding the drivers of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lack of communication between service bodies, which leads to uncertainty, interdependence lack of coordination, lack of incentive mechanisms, and insufficient leadership across departments and organizations. Regarding th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ynamics, there is a mechanical and not systematic enough principled contact, not strong enough common motivation based on understanding and trust as willingness to act, and insufficient capacity for joint action at grassroots level. On the basis of above, a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framework for rural reading services based on digital reading service platforms and corresponding action strategies are proposed.

Keywords: rural reading service　grassroots reading service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digital villages strategy　digital reading service